

風雲激蕩 40 年，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日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着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于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此後，乘着改革開放的東風，涌動着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然不斷嘗試的一個學長，當你們面臨畢業，面臨走出校園的時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三點建議。

1—1978—1979: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帶着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刹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里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着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爲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迹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爲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2—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着對岸，內心正翻騰着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游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着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關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着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迹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爲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3—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紮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難經叛逆”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爲“公司元年”。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關、余明德、張維迎)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鯉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涌！中國留學生帶着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他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學院，帶着一箱行李和30美元，只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瞭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爲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爲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爲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

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蕩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着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爲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爲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着沖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着“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着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爲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爲那里是地獄。”

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爲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注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爲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佈，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爲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爲2.11:1，2015年爲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據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爲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爲“硅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爲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鈞、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爲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干，雨天巧幹，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爲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爲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陞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爲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壹學者王璞